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苏光文,胡国强主编.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621-1491-8

I. 2… II. ①苏…②胡… III. 文学史—中国—20 世纪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504 号

责任编辑:李 玲 钟小族

封面设计:白 好

版式设计:白 好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下)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FAZHANSHI

苏光文 胡国强 主编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 www.xscbs.com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 400715

电话 023—68254353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7

字 数:544 千字

版 次:2008 年 7 月 第 2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1491-8

全套(上、下册)定价:78.00 元

下 卷

第四编 文学的意识形态中心化(1949~1976) 1

第一章 文学的意识形态中心化 3

第一节 文学政治功利性的强化 3

第二节 创作概述 12

第二章 小说 18

第一节 孙犁·杜鹏程·梁斌 20

第二节 赵树理·柳青·周而复 26

第三节 马烽·李準·茹志鹃 33

第四节 杨沫·欧阳山·峻青 39

第三章 诗歌 47

第一节 郭小川·贺敬之 49

第二节 闻捷·李瑛 54

第三节 毛泽东等的旧体诗词 59

第四章 戏剧电影文学 78

第一节 老舍·田汉 80

第二节 于敏·梁信 84

第五章 散文 90

第一节 杨朔·刘白羽 92

第二节 秦牧·吴伯箫 97

第五编 文学发展的多元态势(1976~2000) 103

第一章 文学发展的多元态势 105

第一节 文学新思潮的涌现 105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讨论 111

第三节 文学本体讨论 117

第四节 文学批评模式的多种建构 122

第五节 创作概述 127

第六节 台港澳文学创作概述 137

第二章 小说	148
第一节 王蒙·张贤亮·谌容	150
第二节 贾平凹·陆文夫·高晓声	160
第三节 刘心武·张洁·路遥·莫言	166
第四节 张承志·王安忆·梁晓声·铁凝	176
第五节 白先勇·李昂	186
第六节 刘绍棠·周克芹·古华·韩少功	190
第七节 汪曾祺·邓友梅·冯骥才·张炜	198
第八节 “先锋派”·“新写实”作家群	206
第九节 “后先锋派”·“网络文学”作家	216
第三章 武侠小说	227
第一节 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	228
第二节 金庸	236
第三节 梁羽生·古龙·温瑞安·黄易	246
第四章 诗歌	255
第一节 归来的诗人群	257
第二节 “朦胧”诗人	263
第三节 “第三代”诗人	268
第四节 纪弦·余光中	273
第五章 戏剧影视文学	280
第一节 崔德志·苏叔阳	282
第二节 沙叶新·高行健	287
第三节 叶楠·王兴东·王浙滨	291
第四节 黄允·李宏林	298
第六章 散文	304
第一节 巴金·杨绛	306
第二节 柏杨·三毛	310
第三节 徐迟·贾鲁生	314
第四节 传记文学	318
第七章 少数民族文学	325
第一节 小说	328
第二节 诗歌	339
结束语	345
大事记	351

本书第一版执笔人名单及分工情况	416
本书第一版执笔人名单及所在学校情况	419
第一版后记	421
第二版后记	423

目 录

第二章 小说

毫无疑问,1976年以后文学的多元态势在小说领域表现得相当明显。解除禁锢后的小说,在变革的社会思潮的催发中和它自身的嬗变中,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巨大转换。如果说最初各种潮流之间还呈现出较为显明的阶段性,那么越到后来,小说更替的界线越发显得模糊。

1977年底,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的小说在文坛发出了第一声呐喊,这便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篇作品着重刻画了在那个特定年代的一代青少年心灵遭受扭曲、精神受到污染的状况,并由此发出“救救孩子”的急切呼喊,体现出重大的社会意义。从此,对于人及人的遭遇与命运的关注,对于人情、人性的呼唤与寻觅,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出现了《伤痕》(卢新华)、《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弦上的梦》(宗璞)、《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一批伤痕小说。这批以“伤痕”命名的小说,将笔墨集中在对十年社会动乱给人们身心造成的巨大创伤的描绘上,它们对那场民族灾变的反映和对那个时代的精神处境的认识,通过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和具有一定历史深度的人物形象得以完成,从而改变了过去单一沉闷的小说样式。伤痕小说回复了文学的“真”本质,呼唤社会和文学的良知,真正体现了一场新的小说革命的到来。

但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对“伤痕”的揭示和叙述中,一部分敏锐的小说家意识到,伤痕小说尽管从多个方面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但对引起那场灾变的社会、历史等根源性原因缺乏更深刻的思考。于是,“反思文学”出现了。反思小说的出现,预示着文学由情感的控诉向理性的批判的转化,它的产生与伤痕小说有着相同的社会背景,但它更具思想解放的特征。反思小说在历史内容上的扩展,在历史主题上的深化,一方面打破了过去小说中人物关系的固有模式,通过真实地再现各种人物的命运,进而反思历史、探讨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等即试图从人物带有悲剧性的命运去洞察那些触目惊心的事件的历史动因。另一方面,反思小说显示出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确认,对人的性格



与其在社会中的变异现象的充分暴露。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灵与肉》、王蒙的《布礼》与《蝴蝶》等作品,带着鲜明的反思倾向和自省意识,力求从对人物真正的价值发掘中传达出痛苦的历史沉思。

随着改革大潮的到来,“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改革小说的先声。随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等等,将一个个改革者形象推到读者面前,这些改革者带着巨大的生活热情和时代使命感,投入到浩荡的社会变革的潮流中。应该说,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改革小说仍是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的某种自然延展,它体现了人们在经历毁灭性的身心摧残后对重建家园的期待和渴望。改革小说中的改革者们不仅要将在体制等外在形态的痼疾予以清除,而且要面对更为强大的传统习俗和观念形态的挑战,这使得他们在坚韧顽强搏击之时,总带有悲壮的意味,小说通过对他们悲壮奋争的展示,显现了比弥合“伤痕”更为艰难的历史进程。不管怎么说,尽管“改革”异常艰辛,历史总要前进,小说也在这举步维艰的改革中缓缓行进。

在弥合与变革的二重苦闷中,一部分小说家寻求着小说的新出路,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从社会政治角度去观照人生,而开始把人的性格和命运放到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由此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寻根”热潮。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寻根小说强化了小说的文化意识,使小说的审美品格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而具有深邃的文化底蕴。《大淦纪事》(汪曾祺)、《寻访“画儿韩”》(邓友梅)、《黑骏马》(张承志)、《老井》(郑义)、《棋王》(阿城)以及“商州系列”(贾平凹)、“葛川江系列”(李杭育)等等,都试图从丰厚古老的文化中寻找民族和文学的根,并在对现代文明与原始蛮荒、时代变革与个人信仰的双重审视下,探寻历史的发展走向。他们似乎在悠远恒定的文化图景中发现了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伟力。在这里,寻根小说保持着与1976年以后小说脉络的某种一致,却又显示出极大的不同,它进一步摒弃了过去小说单一浮泛的色彩而更具开放性,它的宏阔姿态使这类作品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纵深感和更为持久的审美魅力。

当一批小说家纷纷走向“寻根”之时,另一批更为年轻的开拓者们看到了小说重新陷入僵化单一的危机,他们试图对小说自身进行彻底变革。在这过程中,莫言充当了某种过渡角色,他的“红高粱系列”努力将文化之根与绚丽斑斓色彩和新奇独特的感觉意象嫁接起来,表明了寻根小说的结束,又宣告了一个新的小说时期的不可遏止的临近。1985年,在《你别无选择》(刘索拉)一声充满焦躁不安的吼喊之后,小说界四处响起“现代派”的呼声,但一批所谓“现代派”写作仍然只是过渡,他们意想通过对传统生

存方式的反叛,构筑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从而完成对自我的追寻。一片喧嚣过后是片刻的沉寂,紧接着以“先锋”姿态出现的一批新秀,裹挟着珍珠和泥沙,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阅读视野和审美空间。这也许是继《班主任》之后一次更为深刻的小说蜕变。一般将马原看做这场“先锋”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拉萨河的女神》尽管出现的时间甚至比《你别无选择》等“现代派”小说更早些,但由于它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叙述功能,从而改变了小说的结构模式,因此被称为“先锋”运动的“秘密宣言”。由苏童、格非、余华、北村、孙甘露等小说家参与的这场“先锋”运动,表达了进一步变革小说文体、探索小说形式意义的渴望。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主题的不确定性、结构的零散性等特点。80年代后期,以《风景》(方方)、《烦恼人生》(池莉)、《一地鸡毛》(刘震云)等作品,构成了“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景观。这些作品,力图回归现实主义的写实传统,以现实中普普通通的人生状况为关注对象,加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描述,以展示日常生活的原生状态。“新写实”小说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先锋”派小说对小说形式的极端强调,使得一部分“先锋”运动的倡导者(如苏童、叶兆言)纷纷转向“新写实”创作。但“先锋”运动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90年代初出现的“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等都是源于这场“先锋”运动的激发和推动。

第一节 王蒙·张贤亮·谌容

王蒙(1934~),祖籍河北南皮,出生于北京。

王蒙的创作始于50年代。1953年,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5年完稿,但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这部描写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充满了纯真、热烈、朝气蓬勃的时代气息,也体现了王蒙初期创作的特色。发表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干预生活”浪潮之下的作品。小说通过对刘世吾和林震形象的刻画,敏感而尖锐地提出了当时共产党内领导干部意志的衰退和官僚主义作风滋长的问题。作为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林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真诚和热情。然而,在老练的把机关工作“看透了”的刘世吾面前,他却显出了幼稚。作者没有把刘世吾简单地描写为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刘世吾形象的复杂性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内涵和深度。对林震初涉人生的迷惘和困惑的描写也使作品越出了一般的“问题小说”桎梏,从中可见王蒙敏锐的思想能力和出众的文学才华。



王蒙 1979 年之后的小说较之于他 50 年代的作品,无论在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变化。“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阅历和磨炼,使王蒙的思想感情复杂了许多,也现实了许多。从 1979 年到 1982 年期间是王蒙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时期。这期间,王蒙陆续发表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杂色》、《深的湖》、《湖光》、《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等一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中,王蒙以一种成熟的理性审视历史的变迁和人生的波折。《布礼》是王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家从对自己的命运和心灵历程的反思入手,展示了我国三十多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及人们在心灵上所经受的考验。《布礼》的叙述像是一种内心告白,带有某种自叙传的性质,因而限制了作品对客观历史作更厚实的表现。发表于 1981 年的中篇《蝴蝶》是一篇充满了痛苦的历史反思的作品。小说通过对张思远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与现实生活多方面的联系的描写,展开一个共产党人既有思辨意味又有诗情色彩的心灵历程,描写他经历了历史动荡之后的主观感受和内心追求,概括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张思远的“自我迷失感”及他对庄周梦蝶故事的反复玩味,并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厌倦者对人生无常的消极感叹,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对政治生活中的弊病的反思和对自身局限的反省。作者以庄周梦蝶的寓言来比喻主人公张思远的命运变幻和自我寻找,把一个沉重的充满失落和遗憾的命运悲剧升华为一个妙悟的浸透人生沧桑感的哲理启示。王蒙自己说这篇小说中有一种“很抽象的也很激动人心的东西”,大约就是这个主题了。《杂色》是王蒙 1981 年初访美时在衣阿华的“五月花”公寓写下的一个中篇小说,在格式上相当别致。小说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写的是一个灰溜溜的中年人和一匹杂灰色的老马在 1974 年 7 月 4 日上午的一段平常的活动。小说主人公曹千里也不同于从维熙与张贤亮笔下的“右派”形象。曹千里身处逆境而能苦中作乐,在内心调侃世事来自我安慰,巧妙地暗示了一种荣辱不惊、听任自然的老庄式的人生观念。王蒙确实是在宽容地对待生活,才会有这样一种心灵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基于对生活的深切体验和理解才不至于庸俗化,反而具有了一种诗的境界。发表于 1982 年的《相见时难》也是王蒙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品。表面看来,小说所写的是一个普通的“回归”题材,但实际上王蒙在对翁式含和蓝佩玉阔别三十年再相见的描写中接触到了敏感而深刻的主题,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西文化再次“相见”所引起的精神上的不安和困扰。正是蓝佩玉的到来,迫使翁式含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文化、历史进行反思并且竭力去回答蓝佩玉西方式立场的“挑战”。使翁式含感到“相见难”的,是一种意识到自己国家落后的“难受的情绪”。这种心灵的痛苦来自于翁式含灵魂深处的矛盾:尊严感和现实感、自信力和自剖力的矛盾。小说正是通过对翁式含这样一个严肃、正直、



热忱的知识分子,一个经历了严酷的政治洗礼而仍然葆有共产主义信念的共产党人内心痛苦的描写,剖析了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新时期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态和心理情绪。

对于1980年前后的文坛来说,王蒙的意义显然不仅仅在于他的小说在思想上的深刻与开阔,他在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王蒙自己将这些小说称之为“中国式的意识流小说”。这些小说借鉴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写法,往往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流动;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从心理的角度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眼前景象、人物的意识和作者的心理分析常常掺杂在一起向读者提供人物复杂的心理图景。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写的都是人物对城市生活和对于时代变化的种种感受,在散漫的叙述中容纳了主人公诸多的观感与思考,扩大了小说的思想容量。“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王蒙所追求的就是“用有限的形式大跨度地来思考我们的历史、现实、城市、乡村。”在谈到《蝴蝶》形式时,王蒙说:“这里边也有象征的,也有感觉的,也有自由联想的,意识活动的,里边还有杂文的东西,也还有相声式的东西,有比较粗俗和比较美妙的东西。”这种“杂烩”式的特点正是王蒙小说创作的风格。

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的一部力作,也是本时期中国文学中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故事的主体是倪吾诚与三个女人(姜赵氏、姜静珍、姜静宜)之间的家庭纷争。王蒙把一场无聊庸俗的家庭争斗写得风波迭起、惊心动魄。由于这个封建家庭恰恰处于近代中国社会革命风云的时代背景之上,倪家几代人的命运故事便具有了深广的历史意味。小说主人公倪吾诚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罕见的典型。他出生于“羊圈脚上搓”的穷乡僻壤,却偏偏有着反封建文化的遗传和先天的革命要求。他留学欧洲,没有学问,没有学位,却有着对欧洲文明的无限向往和追求。但他又注定要生活在封建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中,注定只能在家庭中实践他的西方思想和文明梦。他的无能、怯懦与不切实际使他在和三个女人的较量中节节败退。王蒙在写出倪吾诚痛苦可笑的命运之时,完成了两种不同指向的文化批判,一方面是对中国“吃人”的封建文化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人格的批判。小说中所展示的倪吾诚的生存环境是极其恶劣甚至是极其残忍和病态的。由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观念积淀而成的精神牢狱,无情地扼杀着人的灵魂,倪吾诚被围困在其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一步步走向毁灭。小说还极为精彩地描写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三个女人的形象,尤其是对静珍变态心理和行为精细逼真的描绘,淋漓尽致地揭示出了旧文化虐杀生活和灵魂的“吃人”本质。但是,倪吾诚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化培



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畸形形象,王蒙对他寄予的同情是有限的,更多的是怀着憎嫌写出他言论的空洞和行动的无能,借此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的批判。尽管倪吾诚留学欧洲,崇拜西方文化,但他的幼稚、空谈、胆怯、缺乏行动能力却与旧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弱点是一脉相承的。王蒙辛辣地指出了他的“先天不足”正是他可悲命运的根源之一。应当说,《活动变人形》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它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概括都是极为深刻的。从叙事风格上看,除保持了王蒙一贯的杂文式的幽默笔法,还明显地借鉴了意识流与象征手法,在细节的描写上又带有表现主义的精细的特征,这使小说具有一种超现实的寓意。

进入90年代以来,王蒙的大部分时间便是创作《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四部“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王蒙以过来人与历史学家的眼光,高屋建瓴地审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其中,特别展现了一大群失意落魄的文化人在那个政治化的历史情境中的心理困境,即在严酷的政治困境中所经受的灵魂的压抑和挣扎,以及人格的扭曲和变形的曲折复杂的心理历程。

《恋爱的季节》的故事发生在1951年春天到1953年的春天这段时间。小说描写了一群处于人生花季中的革命少年们的青春萌动和跳跃。他们纯真坦诚、开朗乐观、自信向上,在多梦的青春中编织着自己人生未来美好的梦,并先后步入了对异性的试探靠近或者热恋阶段,“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故事发生在1958年到1961年。“恋爱的季节”里的革命青年们的命运在1957年发生重大分化,多数人被打成右派,少数人平步青云。“失态”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既是历史的“失态”,同时也是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物的“失态”。《踌躇的季节》的故事发生在1962年至1963年。小说以“在树叶差不多已经脱逃了的十一月底”,却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中垂柳出现了“油绿”,对当时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气候加以隐喻和象征。这是一个令人进退维谷“踌躇不安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始于钱文告别北京举家远赴边疆,终于“文革”结束。在这部小说中,王蒙更多地思考了季节的意义。他认为季节不仅是一个人生存于其中的时空范畴,同时也是生活在那段岁月里的人们的永远逝去永不再来的生命记忆。所以季节不仅“永远不可能是单纯诅咒的对象”,同时还有“铁与血的劲舞,剑与火的狂欢”。由此可见,“季节”的命名正是王蒙对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三十年来的历史沧桑、政教兴衰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命运的荣辱与浮沉的反思和隐喻。

与前期小说《布礼》中的主人公钟亦成和《杂色》中的主人公曹千里一样,《季节》系列有很强烈的自叙传色彩。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与历史深思都投射到主人公钱文身

上。在小说中,钱文的命运遭际是贯穿“季节”系列小说的核心线索,从青年团干部、右派,到“回到人民中间”的摘帽右派,再到逃离政治运动中心的摘帽右派,钱文的人生命运和角色在不断地起伏和转换。与之相应,钱文的情感也随之变换,从“恋爱的季节”的亢奋与激昂,到“失态的季节”的惶恐与苦闷,再到“踌躇的季节”的既“踌躇意满又踌躇不决”,最后在“狂欢的季节”里的理性彻底丧失的“文革”期间渐趋沉静。钱文的人生遭际和情感变换实际上代表了如周珠云、萧连甲、祝正鸿、曲风鸣等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从不甘心当右派到死心塌地承认自己是右派;从无情地批判别人到无耻地诅咒自己;从真心革命到满口虚伪的革命言辞;从朋友间的真心相待到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猜忌、处处提防。他们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成了真正的“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学会了自欺欺人、阴奉阳违、见风使舵、曲意逢迎,变得麻木猥琐卑劣无聊;学会了无耻地栽赃陷害、嫁祸于人。他们在无所适从中慷慨地浪费着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毫无意义的辩论斗争中忘记了对生命的责任和义务。钱文等人的悲剧,是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党员身份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的心灵历程,“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

小说中,章婉婉的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章婉婉本是编辑部才华横溢的才女,但在从“反右”到“文革”的那段荒唐年月里,她却逐渐形成了一套“非人”的人生哲学:“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还要脸?”于是,为了在“文化革命”中占得先机,改善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她不惜以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为代价。她以冷静得可怕的“谈判”的方式与丈夫结束了原本和谐美满的婚姻。先是在“反右”中为了“摘帽子”而改嫁给一个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革命,后又在“文革”中为了“回城”再一次转嫁给了一个有“暗疾”的革命“造反派”头目。在“夺权”运动中,她一会儿依附“造反派”一边,一会儿又攀扯在“保皇派”一边,为此付出了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惨重代价。可贵的是,作者并未有意地引导读者去对章婉婉的所谓“道德堕落”进行人身攻击,而是让读者在不经意中跟着作者一道对章婉婉寄以博大的人道主义怜悯。此外,作家还塑造了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在小说中,东菊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倾向于进步的学生积极分子,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生活中屡遭压抑和排斥。在一个奇特偶然的机缘下,东菊和钱文认识并成了钱文初恋的情人,她开始主导了钱文个人的恋爱的季节。在钱文人生命运的低谷,东菊是钱文精神的依靠与皈依,虽然她因与钱文的关系一再受到牵连和打击,但她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做人的操守,反而让危机中的钱文将其生命之舟牢牢地系在自己身上。在东菊这个人物形象上辉映着中国女性最可宝贵的品格,她是作家心目中理想化的具有高尚情操的完美人格人物。



“季节”系列小说,在小说的框架内融合了大量杂文、随笔的书写方式,某些抒情性或议论性的片段单独拿出来,就是很精彩的随笔或杂文。小说综合运用了各种艺术手段,除叙述、描写之外,还较多地综合运用了议论与抒情、悖论与反讽以及内心独白等多种表达方式。在叙述语言上,作者借用了各种充满激情的流行语、生活语、政治语、套语、习语、咒语等,制成一道语言的话语瀑布。从风格上看,作品的某些局部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因素,又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的影子。从作品整体上看,既有现实主义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的如实描绘,又在局部运用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从而形成了一个杂体互渗、多角度、多层面、多声部的立体构成,达到了一种文体的“狂欢”。

张贤亮(1936~),祖籍江苏盱眙,出生于南京。

和许多曾经当过“右派”的作家一样,张贤亮的创作也是从自己几十年的被流放的生涯中搜取素材的。他的多数小说,都以他长期劳动过的西北荒僻地区的生活为背景,具有粗犷、苍劲的荒原气息和原始的野性氛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张贤亮的创作集中在1979年到1986年间。这段时间,他陆续发表了《吉普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土牢情话》、《龙种》、《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初吻》、《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批小说,其中反响最大的是《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这一组以作者自身经验为题材、描写知识分子苦难经历的作品。它们主要采用第一人称主观视角的写法,具有自叙传小说的性质。

曾经一度反响强烈的短篇小说《灵与肉》目的在于写出一个“右派分子”的独特命运,描写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如何从普通的劳动人民那里获得慰藉和幸福。作者自己说是有意识地把“伤痕中能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所以小说着意表现的是主人公许灵均在“改造”生涯中得到精神升华及他对于西北的土地和人民的由衷感激。中篇《绿化树》是张贤亮以“唯物主义者启示录”为总标题的系列小说中的一部。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将一个“右派分子”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苦难给予了充分的展示和深刻的反思。小说中的章永璘的形象要比许灵均更加复杂和内涵丰富一些。小说开头,章永璘的起点甚至比许灵均还低,作家毫不掩饰主人公内心卑怯低下的一面及他在畸形环境中滋长的不良品性和心理。小说描写章永璘在真诚地解剖自己卑俗的灵魂的前提下,一面阅读《资本论》,一面对照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行与人格,同时认真思考严峻的现实,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探寻到了“超脱自己”的真



谛。小说还穿插了章永璘与马缨花的爱情故事。作者以赞赏的笔调写出了她性格中蕴含的质朴之美和野性之美。对于章永璘来说,马缨花不仅满足了他的食欲而且还从堕落的可能中救了他,因而具有了一种圣洁的光彩。作者以哲理和诗意的笔触抒写的是章永璘在苦难的肉体磨炼中如何经受灵魂的洗涤、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的心灵历程。但是,小说中章永璘却绝不是一个讨人喜欢、引人赞赏的人物。作者对章永璘那种自虐式的自省和自我批判以及他那残存的知识分子优越意识都写得极为真实,正是这样一种矛盾扭曲的心理,使章永璘将苦难当成了合理的锻炼,当作了走向崇高的过程,这也正是小说引起多方争议的原因。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章永璘的性心理为描写中心,正面展开了“灵与肉”的冲突及人物内心的自我搏斗。章永璘与黄香久的婚变故事,再一次暴露章永璘性格中矛盾的纠结及心理上的畸变。自以为已经蜕变成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章永璘,以政治或哲学这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将黄香久当做了他“超越”与“升华”的一个阶梯,在道德上遭受读者的谴责是必然的。但正如张贤亮自己所说:“从地狱中生还的人不免带着些鬼影。”章永璘形象的意义便在于写出了“地狱”的残忍。在这篇小说中的章永璘依然是一个“灵”与“肉”相分离的形象。如果说在《绿化树》中,灵与肉的冲突及升华因了章永璘的愧悔的情绪而获得氛围情调上的统一,那么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作家所描写活生生的人的自然情欲和章永璘对政治经济学的思考及由此而产生的使命感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由于缺少必要的中介而未能很好地焊接起来,这是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缺陷。

章永璘的故事并没有继续写下去。1986年张贤亮出版了另一本自叙传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小说以性、政治、哲理构成,时空交错,思路跳跃,并且不时穿插大段的议论。小说发挥张贤亮长于心理分析的特点,描写坦白,议论尖锐。主人公极度的性格扭曲和变态心理的要源,是张贤亮着意要表现的。在《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让人纠缠不清的问题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详尽的注释。可以说张贤亮在这部小说中对自我和政治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当然作家的思想也是不无偏激的。

1992年底,张贤亮还发表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烦恼就是智慧》,是作家本人曾在劳改农场的日记及注释。就叙述的内容来看,主要写饿与吃及种种生存匮乏,而内在的重心是表现在恶劣环境中人物心灵破碎、人格分裂的创痛,延续的还是一贯的主题,但写法有了变化。

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代表人物,张贤亮于1993年初成功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并使得其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在此



后的岁月里,张贤亮潇洒地奔走于商海与文坛之间,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中篇小说《无法苏醒》、短篇小说《普贤寺》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和小说《青春期》。在这些小说中,张贤亮站在新的历史视点下,重新审视和拷问那个疯狂的集体失语全民狂欢的年代里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和心路历史,具有鲜明的自叙传风格。

《我的菩提树》发表于1993年,描述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饥荒时劳改营里的那段真实历史。小说依然取材于张贤亮的那段存留心底挥之不去的人生记忆,展示了那个残酷年代里“极左”思潮是怎样使人丧失人格与尊严,专制与饥饿怎样使人性变得脆弱扭曲甚至可悲可鄙的荒凉悲惨生活的原态。小说主要描写了劳教干部、刑事犯人、受难的知识分子这三种人物形象。其用力最多并且刻画最深的是那些作者所熟悉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都是在50年代“反右派”斗争中因为各种意识形态问题犯了不可饶恕大罪从而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漩涡中,在整天被批判、被臭骂、被改造被教育的思想改造宣传攻势下,他们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摧毁,人格尊严被彻底践踏,人生自然被彻底抹杀。因此,在异常残酷与残忍的政治气候与物质极端匮乏的现实环境中,他们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高度认同非正常群体,带着很强的原罪意识虔诚地接受教育并自我改造,最终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曾经被奴役与奴心的悲哀。作为一个永远的“五七族”,张贤亮为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的懦弱、依附的人格以及精神的扭曲、堕落与泯灭的精神悲剧。

在199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青春期》中,张贤亮再一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展示了那个红色革命时代中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历史形态:从童年时“青春”的混沌初开,到少年时“青春”异化为某种政治口号,再到青年时“青春”的压抑与变形,及至人到中年欣逢新时期后“青春”的迟到与回归。张贤亮不仅对红色革命理想文化秩序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且无情地透视和剖析了知识分子出身的“我”的心理人格的阴暗面,显示了张贤亮竭力地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大写的“人”的意义上反思那一段沉重的民族历史并勇敢地进行自我批判的努力。主人公“我”童年时宣告“青春”萌动的“橱柜事件”可看作是“青春”的开始,少年时因暗恋女同学而产生的“脖子情结”可看作“青春”的勃发,青年时被思想“改造”成一个丧失“青春”冲动而只剩欲望、执迷于“低级趣味的人”可看作是“青春”的退化与萎缩。“青春”作为人的生命本能和原始动力,本应在人的生命成长过程中以“人”的方式得到升华和对象化。然而,在中国的那段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劳改队里强制进行的繁重体力劳动却无情又无谓地消耗和磨损了主人公的



“青春”。为了获得揭秘告发材料,“我”在女厕所里兴致勃勃地寻找一切有关的反动言论和毛主席图像,实际上这意味着“我”的“青春”的堕落或畸形释放。“我”与劳改队长“麻雀”的老婆白彦花之间有名无实的偷情,则暗示着他的“青春”的丧失以及生命的屈辱。最触目惊心的是,“我”竟然为了看护劳改队的水闸而“冷冷地”砍断了一个抢水农民的手指,“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还掂了掂它的分量,猜测它是哪一根手指;又像抚摸女人似地抚摸了一遍我的铁锹。它的锋利就是它的美丽”,“剁了人的一截手指,我的‘青春期’才得到性发泄似的满足。这天我畅快无比”。“青春”在这里已经异化成了非人的罪恶和变态的欲望。由此可见,世纪末的张贤亮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八十年代那种“自恋”的文化心态,跃进到了一种冷静“自审”的精神境界。与前期的小说创作相比,《青春期》没有《绿化树》中表层的政治忏悔,也没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道德辩护,也不像《习惯死亡》那样一味地自我放纵和自我沉沦。张贤亮这部在世纪末“从商余暇”中创作的小说在忏悔精神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带有老年人看世事云卷云舒的睿智和大气,有一种暮年心态^①。就叙事风格来说,《青春期》多了一些调侃的、黑色幽默的调子。就文体而言,小说可以称之为“边缘文体”,它既是散文又是小说,甚至是杂文、论说文,形成一种综合文体。在小说的结构方式上,采取每一章节是一个场景的场景化描写,这种像话剧一样的块状结构方式,无疑是张贤亮在写作手法上作的又一新的尝试。

谌容(1936~),祖籍重庆巫山,生于汉口。

1975年和1978年,谌容分别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1979年以后,谌容的创作出现了重大的转机,陆续发表了《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真真假假》、《太子村的秘密》、《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散淡的人》、《减去十岁》、《懒得离婚》等一批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坛上一位有影响的女作家。

从题材内容来看,谌容的小说大致可分为描写农村生活和反映知识分子命运两大类。谌容自己很珍视那一部分农村题材的小说,但影响较大的却是那些以知识分子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篇《人到中年》是谌容的成名作,描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这种描写带有问题小说的性质,而且“问题”是如此普遍,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小说主人公陆文婷身兼三任:医生、妻子和母亲。作为50年代以后成

^① 李遇春:《世纪末的忏悔——从王蒙和张贤亮的两篇近作谈起》,《小说评论》2001年6月。



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陆文婷对祖国、对人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了强烈的爱。小说通过她治疗三个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患者的过程,多侧面地表现出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对病人满腔热情的高尚的职业道德。但是,超负荷的工作榨取了她有限的精力,使她甚至不能为自己的女儿梳一根小辫,为丈夫买一件汗衫,连昔日的爱情之歌也只能在卧病不起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忆。一心扑向事业,使陆文婷成为出色的医生却不是称职的主妇,从而陷入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小说描写她识大体,顾大局,无怨无悔,但她对姜亚芬出国的理解甚至同情显然表明了她对这种痛苦的清醒的承受,说明她并非心甘情愿,而是情势所然。陆文婷最后在体力下降和心灵的损伤的恶性循环中倒下了。作者赋予人物身殉事业的圣洁色彩,使悲剧气氛趋于极限。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正是陆文婷的人生写照。作者通过陆文婷及她周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剖析了围绕所谓“中年问题”所反映的种种社会疾患,不仅在当时具有发人深省的认识价值,至今仍然引人深思,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散淡的人》是谌容另一篇相当有深度的反映知识分子命运和心态的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杨子丰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他从“一二九”运动起就追随革命,为共产党做了许多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他没有机会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被拒之于党外,直到80年代年近七旬仍被认为入党条件“不够成熟”,未能实现心愿。小说以一种既严肃又幽默的笔调写出了杨子丰耿直坦荡的个性中那无法解开的入党“情结”以及他那散淡狂放的外表所掩藏的热忱与执著。小说围绕对杨子丰“入党问题”的叙写,揭示出了党的某些组织或成员由于对高级知识分子理解上存在的心理阻碍和隔膜,因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谌容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都要涉及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同时谌容也是一个有相当艺术功力的作家,对人生底蕴的深刻体察与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使她的小说人物形象具有一种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上的独特性,她的小说从来都不是某个社会问题的简单演绎,《人到中年》和《散淡的人》都是如此。

谌容也写过几篇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但与同时期绝大多数的女作家不同。谌容并不执意于探讨两性关系的冲突问题,也较少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浪漫色彩。她把目光投向包括女性在内的广阔的人生,从多种角度观察和探讨社会与家庭中的种种生存情态,力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表现客观现实的真实面貌。短篇小说《一封褪色的信》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立场对温思哲和章小娟爱情关系的变化做出了分析。谌容强调的正是客观环境对于主观情感的影响和支配的作用。《错、错、错》写的是一场婚姻在几乎“无事”的状态下破裂的结果,人物之间无法沟通的隔膜当然是情感淡漠的

一个原因,但更深层的根源还在于婚姻的现实性与日常性与人的超越性本能的冲突。《杨月月和萨特之研究》也是对婚姻形式的思考,徐明夫的两次婚姻带来了两家人的痛苦和不幸,但谌容并不是以简单的道德立场对徐明夫或“第三者”刘玉珍做出评判,因为这不幸里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人性的原因。《懒得离婚》以一种纪实的方式描写了一种像“新衣服变成了旧衣服,新毛巾沦为旧毛巾”式的“平平常常、实实在在”的婚姻。这正是普通人不得不面对的烦恼人生。在这样的人生里,理想只是一种奢侈品。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在现实的制约下度着繁难的人生。谌容特有的对于人生的悲剧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更为切近的表现。

第二节 贾平凹·陆文夫·高晓声

贾平凹(1952~),原名平娃,陕西丹凤人。

贾平凹在新时期作家中是很有个性和代表性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创作的多产、多向,更表现在他笔下构筑的小说世界的独特魅力。

贾平凹早期的小说主题,大都是孤独内向的作家对时代社会唱出的一首首充满深情的赞美之歌。就在这种真诚的热情中显露出作家的几分天真、稚嫩。这时的贾平凹似乎还不具备那种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体验进行艺术化处理的能力。《满月儿》是作家真正敲响文学大门的第一篇小说,也可说是他初期小说创作特征的见证: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实关注的激情,但又缺乏透视现实的深度;艺术上则着力于诗情画意的渲染,散文式的笔调和布局。受孙犁的影响,贾平凹追求着一种在田园牧歌式的抒情浓厚的意境中又能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内心冲动的小说艺术。《山地笔记》中的一些小说就是最好的映证。1981年,《好了歌》、《沙地》、《厦屋婆悼文》等小说的发表,使贾平凹的创作有了新的起色:小说的主题不再表现为单一,而有了比较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思考。但尽管如此,“客观描写上的薄弱,主观抒情上的浓重”小说模式还是未能被突破。此后,贾平凹沉浸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和西方文化的涉猎之中。于是,贾平凹的视野越来越广博、越来越深邃,也越来越神秘。他再一次地思考着一条既能表现民俗学内容的商州风情,又能传达自己对传统文化及现代文明感受的艺术途径。1983年后,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特色便从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商州系列”小说表现出渗透了作家复杂情感的地域性特色。首先,贾平凹以审美化的笔触,描述